

司马迁新证

◎ 张韩荣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张韩荣 笔名韩嵘，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在原西安公路交通大学执教，现为地方行政干部。长期从事文史创作与研究，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诗集《我在石头上坐好》。现为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中国传记文学协会会员，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常务理事，韩城市司马迁学会副会长。

《司马迁新证》是作者把历年来发表于报刊杂志的文章及讲稿，予以结集出版。全书以司马迁生平研究为主线，涉及《史记》有关内容，并对韩城地方史进行了深入的钻研，汇集了许多新的学术成果。

思维世界的新发现

乙未年春月日陈兆朋书

◎张韩荣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司马迁新证 / 张韩荣著. — 西安 : 三秦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518-1018-0

I. ①司… II. ①张… III. ①司马迁 (约前 145 或前
135 ~ ?)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2256 号

司 马 迁 新 证

张韩荣 著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16
印 张	17.5 印章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018-0
定 价	56.0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bs.cn
-----	---

序 言

张新科

近日，韩城市司马迁学会张韩荣先生把他研究司马迁与《史记》的成果结集出版，邀我写序，我欣然答应，一则由于自己多年来一直从事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关注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新成果；二则同行出版新著，可喜可贺；三则这也是我进行学习的好机会。

认真阅读了张先生的书稿，我觉得有三大亮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作者敢于创新、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成果丰硕，解决了不少问题，也留下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还有一些缺乏资料而悬而未决的问题。张韩荣先生多年研究司马迁与《史记》，熟悉研究历史和现状，对《史记》研究史上一些重大的疑难问题多有涉猎。如书稿中《司马迁生年新证》、《司马迁未参与元封元年泰山封禅考》、《“庄为太史”考》、《孔安国新证》、《再论孔安国》等论文，都是非常有难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紧紧围绕司马迁生年而展开。关于司马迁生年，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公元前145年和公元前135年之说占有优势，王国维即主张前145年之说。张先生从《太史公自序》及其他资料中寻找内证、外证、旁证，深入探讨问题，赞同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之说。在此基础上，张先生结合历史背景重新编制太史公年谱。应该说，本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此。虽然不能作为司马迁生年的定论，但这种大胆创新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另外，对孔安国生平的新发现，认为他并不是司马迁的老师或长辈，两人关系是文朋益友，这个结论对考证太史公的生年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还有周初诸侯国数量问题，依从《史记》和《吕氏春秋》，认为周初有大小诸侯国共计1200多；还认为韩城一地为中国贡献了芮、韩、梁、庞四个姓氏；还认为白居易的原籍在韩城，

等等。这些观点都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第二个亮点在于地方特色。作者是司马迁故乡的人，喜爱司马迁，热爱韩城，熟悉韩城。韩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丰厚的文化积淀。黄河、龙门、禹门口、梁山、魏长城、三义墓、芝川、太史祠、文庙、徐村、华池村，等等，都有许多美妙的故事。本书稿结合《史记》进行韩城地方史的双向互动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书中探讨韩城文史的论文，既有书面资料，又有地下考古资料和民间传说资料，还有作者实地考察所得，使研究颇有地方特色，并且多有创获。如《韩城古代史疑难新释》、《司马后裔“冯为长门”是误传》、《芮国再现》、《韩梁芮庞四姓源自韩城》、《白居易原籍在韩城》等问题，既是韩城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问题，也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作者所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值得文史研究者进一步探讨。

第三个亮点在于研究方法方面，作者能把考、论、辨、驳等方法融为一体。既有理论的分析论述，又有事实的考证辨析，乃至对一些观点的驳论，显示了作者颇为深厚的文史功底。如《司马迁〈货殖列传〉的经济思想与社会理想略论》、《“庄为太史”考》、《〈平准书〉辨析》、《〈赵氏孤儿〉考辩》、《〈史记探源〉驳论》等题目，就直接体现了作者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虽说是传统的方法，但在文史研究中仍然是切实可行的有效方法。而且作者在考辨驳论中树立自己的观点，有理有据，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当然，由于本书稿是论文集，写作时间不一，有些地方不免重复。有些问题的探讨还有待于继续深入。另外，由于所探讨的是学术重大问题，敢于挑战王国维等人的观点，有些地方的话语显得过于激烈。学术争鸣是好事，但要尊重对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讨论。总体来看，这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对于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张韩荣先生的新著引发我对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一些思考。一是两千多年来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留下许多疑案，尤其是司马迁行年中的疑案。这些问题很难一时解决，还要不断研究，即使是一点新见解，都可以进行细致探讨，仍然是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客观来说，这些疑案问题的彻底解决，有待于新资料的挖掘与发现。二是关于司马迁研究的资料，我曾在有关著作中特别提到乡土材料，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包括民间传说和地下出土材料。司马迁研究离不开韩城特有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这里可以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资料。韩城市自从1985

年成立司马迁学会以来，30年来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探讨，学会的成员多方面整理和挖掘地方文史资料，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提供了大量重要的资料，张韩荣先生的书稿就是其中的一部。这样的工作还要不断地进行下去。三是《史记》研究的普及与提高问题。《史记》研究不只是在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还应走进千家万户，让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知道司马迁，知道《史记》，这是建立“史记学”的现实基础。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重要的是，既要普及司马迁与《史记》基本知识，也要普及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成果，使学术研究更接地气，更富有生命力。

司马迁是伟大的，《史记》是不朽的，我们的研究也是要一直延续下去的。我在《史记学概论》一书中曾提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远大目标：综合化、理论化、多样化、立体化、世界化、生产化。这个目标，是需要一代一代的学人努力来做的。借此机会，拿这个目标来，愿与张韩荣先生共勉。

2015年4月15日于西安

（张新科，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

目 录

一、太史公行年考·····	001
司马迁生年新证（一）·····	003
司马迁未参与元封元年泰山封禅大典考·····	007
司马迁生年新证（二）·····	012
太史公年谱·····	023
司马迁小传·····	058
司马迁生年简析·····	061
司马迁与《史记》概论·····	064
“庄为太史”考·····	068
司马迁之死·····	071
孔安国新证·····	075
司马迁的文朋益友·····	083
再论孔安国·····	086
司马迁生年新证（三）·····	089
二、《史记》名篇选论·····	099
《货殖列传》的经济思想及社会理想略论·····	101
《货殖列传》札记·····	108
《平准书》辨析·····	115
论《河渠书》·····	121
论《游侠列传》·····	126
论《儒林列传》·····	131

论《报任安书》·····	135
从夏商周秦，看中国统一的步伐·····	139
《赵氏孤儿》考辩·····	145
李陵案始末辩证·····	153
司马迁与道家·····	164
《史记探源》驳论·····	170
 三、韩城古史散说·····	 177
高门原遐想·····	179
从《左传》《史记》看芮国·····	183
芮国再现·····	186
孔乐韩土·····	195
龙门史话·····	198
夏阳的由来·····	200
“三国演义”在韩城·····	202
韩梁芮庞四姓源自韩城·····	205
众城之城——韩城·····	209
《赵氏孤儿》与韩城·····	212
司马迁与李陵·····	215
韩城古代史疑难新证·····	222
探秘司马后裔·····	227
司马后裔“冯为长门”是误传·····	231
韩城那一千年史·····	233
司马世家略述·····	248
白居易原籍在韩城·····	256
历史是科学·····	262
 跋·····	 267
后记：活的历史·····	268

太史公行年考



司马迁生年新证（一）

关于司马迁生年问题，史学界经过近百年的研讨，已定格于两种说法。一是王国维为代表的“景帝中元五年”^①说，一是以李长之为代表的“武帝建元六年”^②说，即公元前145年与公元前135年。两种说法相差整十年，容易相互颠倒，至今也未能确定下来。

双方立论的最初根据都是《史记·太史公自序》^③的注释，“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上推为前135年；“五年而当太初元年”，《正义》，“案迁年四十二”，上推司马迁生于前145年。二者仅相差五年，若四十二岁为三十二岁就与“年二十八”吻合，即司马迁为太史令的第五年是太初元年，当三十二岁，改历与始作《史记》，这是司马迁一生重要的年份，张守节注司马迁当年年龄的本意就是为了突出这一年的重要，并不是要纠正司马贞《索隐》的证据。显然，这两种根据与司马迁生年的两种说法必然有一种是错误的，二者必居其一。仅按优选法，也以官方授司马迁太史令的登记簿为宜。

要澄清生年问题，必须回到王国维的推论。王国维的推论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定《博物志》那条记载是第一手原始资料，为司马迁当上太史令时的官方登记簿，完全可靠；另一方面，他又断定登记簿中“二十八”应为“三十八”，这样便与“四十二岁”的注文相符。其实，他在调和两条不同的注文，轻率地把原始档案材料的“二”换成“三”（实为廿换成卅），便使司马迁早生了十年，这就是王国

①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见《观堂集林》卷十一，又见《史记研究集成》第一卷，华文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②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版。

③《史记》第十册，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维的数字讹误说。为缝合他的考证，他不顾汉朝为郎皆宜在二十岁上下的事实，而推迟司马迁入仕于三十岁，宦官世家的司马迁怎么会参加工作如此之迟，而且“二十岁壮游”迟迟不归，仿佛朝廷空着岗位等司马迁慢慢归来。这是谬论。王国维对现代研究司马迁生卒年问题有首创之功，但他对司马迁生年问题也有首乱之过，与事实不符。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前 145 年说”给司马迁虚增十岁，其潜在原因是不相信年少十岁的司马迁能写出《史记》来，或希望太史公多活十年的恻隐之心。因此，他的推论是虚妄的、生硬的、主观的，长期误导着史公生年问题的研究。

那么，关于司马迁生年再无铁证可寻吗？司马迁对自己的生年是怎样叙述的，到底有没有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到《太史公自序》中寻找答案。

《太史公自序》：“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①中间省略部分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是对先秦六家学派的高度总结，是一篇哲学论文，极为精辟。司马迁记载父亲在入仕前的学习情况，入仕于建元年间，而逝于元封元年，工作约三十年，享年五十余岁。司马谈从入仕到“掌天官”成为太史令肯定时间上有一个过程，而司马迁在叙述父亲“仕于建元”、“既掌天官”两个时间概念以后，才写到“有子曰迁”，况且中间还隔着父亲《论六家要旨》的长篇论文，这些话是否告诉人们他出生于父亲参加工作以后，更确切地说他出生于父亲“掌天官”以后？在史学界意识到这一点的学者少之又少，笔者仅见李长之涉及一笔^②，大家都忙着翻找证据，在枝节问题上推论不休，却把司马迁自述的本证丢在了另一边。不难看到司马迁是严格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记述他的家世和个人经历的，远没有现代文学的“倒叙”、“插叙”等手法，明确了这一点，再来看司马迁下面的叙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返，见父于河洛之间……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③引文足以证明，司马迁在整篇《自序》中严格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生

①《史记》第十册，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②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版。

③《史记》第十册，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活经历，没有一句记述打乱时间的次序，这就可以证实司马迁出生于父亲“掌天官”以后，至少绝不在父亲建元入仕以前。建元元年为公元前140年，是汉武帝承继大位的第一年，司马迁绝不会生于前140年以前。

其实，争论近百年的司马迁生年问题并不难解决，首先深入领会全文，再结合注释，就可以释疑。

《太史公自序》从追叙远祖开始，终于《史记》完成，始终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毫不混杂的记载。这是全篇的叙述逻辑，不打乱历史顺序，没有插叙、倒叙或意识流等打乱时序的表现手法。深入掌握这一点，相信《太史公自序》记叙的真实性和逻辑性，就不会被误导上歧途。

司马迁在记述自己出生前两次涉及前置的时间，一是“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年间”，一是“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这两次前提的时间条件（况且其间隔着《论六家要旨》一文），结合注释，说明司马迁生于父亲入仕以后，绝不会生于父亲入仕以前。确切地说，司马迁生于父亲入仕，当太史丞，再当太史令以后，甚至就在父亲成为太史令当年他出生了，对当上太史令又喜得儿子的父亲司马谈实可谓双喜临门。

具体地说，今本《史记》在关键处存在着标点问题。“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有子曰迁”句的主语是太史公，不当为句号断开，而应当用逗号，这样司马迁生年的确切时间就会突显出来，即“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说明司马迁生于父亲掌天官以后。为证实史公出生问题，这句话可以暂时变成：“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如此，就可以更加分明地看清史公的生年，而不再疑惑。造成“有子曰迁”标点问题，本来就因生年不明、暂为断句，致使“有子曰迁”一句浮游无主，便可上下移动，年份难辨。这个错误标点急需纠正，以正是非。显然“有”字的主语是“太史公”，“有”句归属主语。

结合三家注，注文“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无疑是司马迁任太史令之年，官方注册的簿文，不难上推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与《自序》的文意，即司马迁的自传完全相符，而所谓“42岁”说上推司马迁生年为公元前145年，实是“32岁”的误传误抄。坚持“前145年”者，即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派，在史公生年问题上，实为误导人们的谬论制造者。两种史公生年的说法，正巧相差十年，也易于造成来回颠倒的现象，甚至廿、卅、卅互

相倒置。王国维的荒谬在于他在肯定官方资料为珍贵的原始档案的前提下，凭空臆断文中“廿八”为“卅八”，以符合“迁年四十二岁”的注文，而其实是后人把“卅二”误抄为“卅二”。他一方面调和了两条注释，另一方面给司马迁虚增十岁，既对史公具有恻隐之心的同情，又是对年少十岁的史公是否能写出巨著而产生的疑问。当然，他并没有完全肯定自己推言的结论，对史公生于公元前145年的看法是勉强的、怀疑的、有待确证的。

至此，结论出来了。司马迁绝不会生于父亲入仕或建元元年以前，也就是说“前145年”说是脱离《自序》本证的臆语，是荒谬的；司马迁自传与注文的官方档案证明他生于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距今2145年，同时证明司马谈入仕当在建元元年，经任太史丞，而后不晚于建元六年成为太史令，并铸就《论六家要旨》这篇十分精彩的哲文。

司马迁未参与元封元年泰山封禅大典考

史学界一致认为，元封元年（前 110）泰山封禅大典，司马谈因病未能参与，并于当年逝世，而司马迁参加了此次封禅大典。历史的真相果然如此吗？其实，其中的一系列问题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诠释，如司马谈逝世的原因，具体时间和地点，逝世于洛阳、长安、夏阳三地的哪个地方？谁为他安葬，如果是司马迁，他能参加封禅活动和一万八千里的大巡疆吗？司马迁“还报命”到底在哪里？王国维对司马迁生平有极深的研究，他的观点，尤其在泰山封禅大典这个问题上最具代表性，有必要予以分析。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①说：

“其明年（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缙氏，登崇高，遂东巡海上。夏四月癸卯，还登封泰山；复东巡海上，自碣石至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盖史公自西南还报命，当在春间；时帝已东行，故自长安赴行在；其父谈当亦扈驾至缙氏、崇高间，或因病不得从，故留滞周南，适史公使反，遂遇父于河洛之间也。史公见父后，复从封泰山，故《封禅书》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后复从帝海上，自碣石至辽西。故《齐太公世家》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又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故《蒙恬传》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直道者，自九原抵云阳（即甘泉）之道，《秦始皇本纪》所谓‘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者也。父谈之卒，当在是秋，或在史公扈驾之日矣。”

笔者认为，王国维分析的史公还报命的时间“当在春间”是正确的，根据《史记·封禅书》准确地说为“三月”，其他就难以置信。司马迁不可能弃置病危的父亲于

^①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见《观堂集林》卷十一，又见《史记研究集成》第一卷，华文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